

學律求索

諸煥灿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学 津 求 索

诸焕灿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学津求索

诸焕灿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浙江省新昌印刷厂 印刷

34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75 印张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500 册

ISBN 7-104-00924-8/L-417 定价：16.80 元

自序

笔者德薄能鲜，一生碌碌，生遇郑虔之清寒，未能攀高等学府之门墙，却存颜渊乐道之心。痴迷于孔孟、阳明之学，喜欢舞弄文墨，几十年来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越读书，越觉得文章乃神圣之事业；越读书，越滋长了书生之意气。有人说我直，有人说我憨，有人说我胡闹，不管他，我行我素。嗜好古文献，写的也大多为历史性论文。月旦人物，信笔由之，无暇顾及文章出来后之后果。虽在非常时期也吃过一些因文字而生的苦头，但生性健忘，苦过也就忘了，积习已经难改。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笔者才固平平，何来不朽之业。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就弃其大求其小，唯有跋涉精神小路，玩弄点小道，只求速朽而已。况且，涂涂抹抹，正是我等小文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独特追求，于虚无之中去求索一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罢了。多年下来，也就有了几十篇不像样的文章。在不少学友的怂恿之下，即生结集出书之野心。

收入此集中的文章，有对阳明学说之求索，有对南雷史事之求索，有对姚江学术之求索；间或颂圣称先贤，或蠡测经史，辩误证伪，或言他人所未曾言者。阳明有言：“君子之学以明其心。”但笔者秉性喜酒，一饮即醉，一醉即糊言乱语，有时迷狂，有时清醒，有所学而尚未达明心之境。但想到圣人亦择狂夫之言，故此不弃浅薄，集成此书。

临出版之前，由于笔者既不工于逐末，乃无术以资生，只藉笔耕、舌耕之获，尽儋石之储，难以付梓。故有好友叶德琛、翁国畅及余姚阳明税务师事务所、银环流量仪表有限公司等之资助，特在此致谢。另外还得感谢章亦平先生等老前辈之鞭策，感谢市文联谢志祥等同仁之精心策划，感谢几位老同学旧朋友如俞兆水等之敦促，才得以有此论文集之墨香可闻。

当今世上盛行请名人作序。得名人一序以冠书首，自可给文稿增添无穷胜色。奈何笔者之小文章，唯有惶恐赧颜而已，何敢惊动大名人，只好自导自演自击锣鼓，自以为序。

庚辰年孟夏之月醉后书于明心草堂

目 录

自序	(1)
心学大师王阳明传评	(1)
王阳明与余姚.....	(22)
王阳明行迹考察散记.....	(29)
姚江王氏 迁居山阴 争嗣爵位三考.....	(73)
《王阳明年谱》订误.....	(91)
王阳明弟子杂考	(103)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解放作用	(123)
王阳明讲学活动及教育思想	(141)
王阳明教育思想与现代素质教育之比较	(152)
王阳明的仁政思想	(171)
王阳明的军事学成就	(186)
王阳明的工商思想	(199)
梨洲先生故居考	(208)
黄宗羲“梨洲”“南雷”两号探微	(215)
黄宗羲“续钞堂”考辩	(225)
黄宗羲与“姚江书院”派之异同	(234)
论黄宗羲气节心态之变异	(246)
黄宗羲与朱之瑜关系考索	(257)

朱舜水直系后裔考索	(271)
朱舜水的寓日故国友人考略	(279)
“客星犯御座”与严光之隐	(290)
明代余姚籍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	(300)
浙东学术概说	(313)
姚江王学与“姚江书院”	(337)
《姚江书院志略》与姚江书院	(345)
奇特的史前文化遗址——河姆渡	(353)
虞舜故里在余姚	(362)
谢安高卧之东山考	(371)
浙东第二藏书楼五桂楼考略	(378)
姚江流域的古代科技	(390)
《梁祝》故事渊源及时代背景	(400)
何必替汉奸洪承畴翻案	(412)
屈原生年等史料订误四则	(424)

心学大师王阳明传评

明代，是皇权专制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为了给皇权专制营造一层封闭的坚硬外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一种官方的哲学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明统治者以对程朱理学非凡热忱的心态，命廷臣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诏令：“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禁绝学子对社会现实问题予以思考。由于实施严酷的思想和文教政策，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日趋没落的凄惨局面。明统治者全力剥夺文化人的思想自由，强力控制社会文化系统，明代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帝皇意志和正统观念。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朱熹之学成了人们猎取功名富贵的手段，成为教条而僵化，逐渐为人们所厌弃。社会要前进，首先就得打破封闭的思想外壳，使民族智力得以自由发展。明中叶，资本主义开始在我国东南地区萌芽，农民起义彼伏此起，各地藩王谋叛，朝中权宦专横乱政。在思想界却是学术不明，道德沦丧。正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困惑、不满，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以弃科场、不事著述相尚。这既是对当时朱学末流的厌倦，同时也是要求变革的先声。此时亟需有一个新思想体系的创建。到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要，它首先揭示出几百年来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的宋代陆九渊心学，上承孟子本旨，创“良知”学说，起而与官方哲学抗衡，尤如巨石投水，晴空霹雳，在思想界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它冲决了程朱理学的堤防，使之崩溃。

一、王阳明生平传略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学者尊称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心学大师，著名的学家、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明成化八年，王阳明出生于余姚城内龙泉山北麓的瑞云楼。他自幼多病，至五岁时才开口讲话。到读书年龄，即拜姚城名儒陆恒为师。他记忆超人，思路敏捷，深得祖父王天叙的宠爱。王阳明从小喜好象棋，以致沉湎而忘攻读，母亲天天规劝，不听。家里下象棋有母亲阻拦，就到外面去下。一日，约上棋友，在离家不远的武胜门外桥下对弈。时至午间，母亲多次呼唤，王阳明和棋友没有觉察。母亲寻至武胜门外桥下，见儿子专注于象棋，一时气极，即将象棋倒入河中。王阳明见象棋被河水冲走，惋惜不已，当即随口吟出一首《棋落水》好诗来：“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帅溺水一齐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入川逐浪流。炮沉江底寂无声，象窜心头使人愁。”（参见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一）站在一旁的母亲见儿子吟出这样一首好诗来，正是又好气又好笑，也就不好再下手打儿子，只是把王阳明拉回家中吃饭。

到成化十七年（1481），其父王华考中状元，任职京师。第二年，十一岁的王阳明随祖父王天叙进京。途经镇江金山寺，当地士子宴请王天叙。席间赋诗，众人尚未成稿，王阳明率先赋就，吟唱：“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王阳明全集·年谱一》）众客大惊，命再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略一思索，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同上）诗中含有大小对比的辩证关系，表露出了少年哲人早熟的机因。

至京后，王阳明随侍父亲身边，勤奋攻读，并开始树立“读书学圣贤”之志；年十五，访客于居庸、山海关，因得以纵观山川形胜，兵争要害。十八岁，王阳明赴南昌与夫人诸氏完婚。岳父诸让，字养和，成化十一年进士，亦余姚名儒，王华之友，时任江西布政使参议。新婚洞房之夜，王阳明听说当地铁柱宫道观新来一位著名道士，他急不可耐地前去拜访，求教道家哲理和养身之道，两人对坐长谈，忘怀一切，直到东方发白，方赶回新房。婚后，王阳明专攻书法，日日临摹古帖，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即通其法，书艺大进；学书之馀，即研习兵法。年底，王阳明与夫人诸氏同归余姚，途经上饶，又曾借机去向著名理学家娄谅请教，共同研讨了朱熹之学。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一岁）中举之后，学道家养生，学宋儒格物致知之法，学兵家秘籍，学列阵骑射。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举进士，分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边事危急，王阳明疏陈边务八条。不久即授刑部主事。弘治十四年，奉命赴江北审录囚犯，冤狱多所平反。弘治十五年，因病告归，来到会稽山中的阳明洞天，筑就一间草房，专心修身养病。第二年转移到杭州养病，并与山僧研讨佛理。经反复探索、比较，结合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渐渐感到佛、道两说均与情理不合，于社会无补；对朱熹的理学束缚人性也颇不满，感认到只有孔孟原始的儒学有益于社会，于是他开始寻求真正的“圣学”。弘治十七年，遂返京复职，想以所学为国为民效力。该年秋，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弘治十八年，王阳明开始讲学，首先倡导为学必须先树立学习圣人的志向。时有湛若水与他结成知心好友，共同以倡明圣贤学说作为第一志向。

正德元年（1506），宦官刘瑾受武宗宠幸，专权害政，施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大批忠直之臣被陷害致死。这年冬天，王阳明为营救南京科道、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触犯了权宦刘瑾，被

廷杖四十入狱。时有众官劝王阳明之父王华到刘瑾门下求情，何况刘瑾亦知王华名士，希望王华求见，扬言只要王华亲自来为儿子王阳明认错，王阳明不仅可以释罪，还可升官任用。但王华刚直不阿，说：我儿为劾刘瑾而获罪，理直名香。始终不见刘瑾。刘瑾怨恨，即将王阳明贬谪到穷荒僻远的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并将他父亲王华亦调离京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又借故罢免归家。王阳明赴谪行至钱塘，刘瑾使人跟踪追杀，危急之中，王阳明乃赋绝命诗，置衣冠钱塘江岸，伪装自沉，潜附商船抵福建，转道赴龙场驿。

正德三年春，王阳明抵达贵阳龙场。古龙场驿（今修文县）地处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之中，山穷地荒，瘴疠蛊毒，环境险恶，风气闭塞。王阳明在龙场三年，努力搞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俗化导，万事和善处之。面对险恶的境遇，没有怨天尤人，处之泰然，以乐观的态度对待险恶的环境。乡民为他建木板房，供他居住，他名之为“玩易窝”、“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等。他创办龙岗书院，远近汉、苗、彝族子弟汇聚于此听讲，精心培育，士始知学，使荒僻之地得以开化。时有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亲来问学，始明王学大旨，遂与毛宪副修葺贵阳城文明书院，邀请王阳明主讲文明书院，身率贵阳诸生，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向各族群众传播文化知识，并于年始论“知行合一”，倡导学生自求本体。王阳明以一驿丞而大启西南之教，开启黔贵文明之功实不可泯。他时刻反思以往的人生经历，在险恶的境遇里不断进行自我扩充，表现了作为伟大哲学家旷达的气度和风范。四周的客观事物都成了他陶冶性情、锤炼意志、追求圣人境界的资藉。他怀着困境不堪其忧，圣人不改其乐的意念，潜思彻悟，超脱于生死荣辱之外。他发挥“良知”的能动性，哲学思想转向宋儒陆九渊，按儒家的圣贤观念去改造环境，去追求成圣之路，遂逐渐自成体系。后人对王阳明这段龙场经历，称之为

“龙场悟道”。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至江西庐陵县任知县。在县七个月，处理政事以开导人心为本，劝谕百姓敬老扶幼；惩治贪恶，审决积案，疏清邮驿，畅通商贾；杜绝苛捐横征，禁止迷信神会；选举三老，设立保甲，仅以几个月时间即达到政清民乐。是年八月，权阉刘瑾因谋反下狱伏诛。至年底，王阳明升任南京刑部主事，第二年正月即改任吏部主事，二月任会试同考官。正德七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在这一年，有不少学子如黄绾、朱节、徐爱、蔡宗充等二十馀人拜王阳明为师受业，他们后来均成为著名学者。年底，王阳明被擢升南京太仆少卿，上任前奏请回余姚省亲。明年春，率学生友人徐爱等入四明山游览，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杖锡，至雪窦，上千丈岩，以望天姥、华顶，沿途随景点化学生，取道宁波还余姚。正德八年十月，赴滁州督马政。政事之空暇，即讲学于滁州琅琊山，以滁山佳景来点化学生。他的讲学活动从此兴盛起来。

正德十一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了解王阳明是一个奇才，推荐擢任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该时，闽湘赣粤各县交界处暴乱频仍，官军征剿往往失利。王阳明改变前任只知剿杀的政策，注重于安抚及善后处置。调整兵制，选派民兵，行十家牌法，设立兵符，侦敌虚实，出奇制胜；率先平定漳州暴乱，然后平定横水、桶岗、大帽、浰头等处暴乱。依据地理位置的需要，增设和平、平和、崇义三县，始筑城池，为发展这三处山区的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王阳明所统率的都是书生及偏裨小校，却能摄之以静，平数十年巨难如拉朽，远近莫不敬之以为神。事后，为稳固民心，发展生产，他严惩逼民造反的恶霸乡绅、贪官污吏，以解除民患。他召集各地长官，指令他们去除苛捐杂税，减免徭役，救灾赈济，真心安抚民心。他还亲自派出官军，帮助百姓造房筑舍，开僻山道，修造梯田，施

放耕牛和种籽，劝令农民勤耕纺织。并兴办社学，改进教化，达到移风易俗，协调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赣南的农民斗争有着反封建统治的一面，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纲领，尤其是一些首领人物因个人品质的原因，打家劫室，占山为王，蹂躏乡里，裹胁群众，杀人越货，奸淫虏掠，我们很难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依据特定的历史条件，王阳明在赣南的军事行动，对安定社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恢复农业生产、使数十万生灵免受战乱之苦，作出了对国家和百姓均有利益的业绩。王阳明一贯坚持能安抚则安抚，不滥杀无辜，恩信显著，他的军队亦被当地群众称之为“仁义之师”。十三年六月，晋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军务。

正德十四年六月，福建发生兵变，王阳明奉命去调查处理叛军事件，途中突闻南昌宁王朱宸濠谋反，叛军已北上围困安庆。南昌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改封之地。至正德年间，已由朱权的玄孙朱宸濠承嗣王位。朱宸濠见武宗无子，遂生夺位之心。他暗结权宦，私蓄兵马，经营多年，遂于是年举兵发难。叛军发南昌，略九江，破南康，围安庆。王阳明获宁王谋叛的确信，即返吉安，召集义兵，趁叛军北上围攻安庆之机，设计直捣南昌，首先夺回了宁王谋叛的基地南昌城。宁王见南昌被王阳明所占，即撤安庆之围回救南昌。王阳明设伏兵于鄱阳湖，先后与叛军接战于黄家渡、八字脑、九江、南康等处，火烧叛军战船。最后在樵舍一仗，俘获了宁王。一场蓄谋多年的亲王谋叛事件，经王阳明设疑制奇，先后仅用了三十五天就一举平定，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当王阳明捷音送达朝廷时，众多原先与宁王同谋或有牵涉的嬖幸，以及害怕王阳明功高晋级的权贵们，纷纷诬言构陷，极力排挤王阳明，祸将不测。王阳明建有戡定祸乱之功，却是功高遭忌，只得假称有病潜居于杭州西湖净慈寺、庐山白鹿洞书院。武宗使人暗中观察，了解到王阳明正直无私，并无异心，一时顿悟，即下旨命王阳明兼任江西巡抚，速返南昌理

事。王阳明以文臣领兵，行军布阵，用兵如神；他边讲学，边出军，运筹略于讲堂，决胜利于战场，成为明代三大军事家之一。

正德十六年，王阳明饱经忧患，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用来忘患难、出生死，故于平息宁王叛乱之后，更自信而坚定，于是正式揭示“致良知”之教。他曾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王阳明全集·年谱二》）于是，王阳明经悉心探索，始完成他的“心学”理论体系。

这年三月，武宗死，世宗嗣位。六月，世宗召王阳明进京候用，行至中途，被辅臣暗中派人所阻拦。王阳明知道权奸暗中刁难，此行凶多吉少，当即乞请便道归余姚省亲。世宗准令王阳明归家省亲，特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二月，论功封赏，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敕建“伯府第”于绍兴府山阴县东光相坊，全家自余姚迁居越城（余姚县历来归属绍兴府）。嘉靖元年（1522）二月，父亲王华病逝于家中。王阳明守制居丧，遂讲学于余姚、绍兴两地。在余姚，设讲学堂于龙泉山中天阁，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廿三日为会讲日，由王阳明亲自主讲，听讲者多时达三百余人，其馀日子由他的弟子钱德洪讲解。在绍兴，讲学于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听讲者亦众。主要教授“良知”之学。三年丧期满，由于朝中权贵的妒忌、排挤，未能按期起用。

嘉靖六年，广西田州土官知府岑猛父子，同思恩州土官都指挥同知岑浚祖孙、头目王受等多年互相仇杀，百姓遭难。朝廷特派都御史姚镆发兵征讨，由于姚镆举措失当，盲目地改变官制，遭到土官头目的反对，致使事态扩大。田州土官遗目卢苏、思恩州土官遗目王受为了达到承袭土官世职，遂于嘉靖六年勾众叛乱，搞民族分离，闹政治独立，以达到脱离朝廷之目的（参阅《明史·广西土司传》卷三一八）。任何民族希望取得同其他民

族的平等地位而提出自治要求，应该说是正当的。但如果以民族压迫作为鼓动叛乱的口号，以达到分裂的目的，这是反动的，是不符合中华整个大民族利益的政治分离行为。六月，朝廷任命王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出征思田。九月初八日临起程前夕，王阳明为学生钱德洪、王畿讲解了《天泉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年谱三》）十一月二十日，王阳明到达广西梧州，开府理事。十二月命王阳明兼任两广巡抚。王阳明经过调查之后，即写奏疏上报朝廷，认为：动用刀兵并不妥当，而用招抚有十大好处，改设流官也不如仍任用土酋有利。王阳明接受土酋卢苏、王受的投降，结果是不动一刀一箭，未杀一人一目，于嘉靖七年二月，平息了田州、思恩州的暴乱。奏立岑猛第三子岑邦相为吏目，俟有功时再擢升任土官知府，以顺土夷之情。同时设立流官知府以牵制土官之势，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土酋之党，使之相安无扰。兴办思恩、田州、南宁学校，延师授徒。广西境内的八寨、断藤峡蛮酋负固稔恶，流劫出没，为害岁久，百姓旅人深受其苦，使地方不得安宁，遂于七月率兵分道出征，一月之内，尽平山寨，消除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西南边陲百姓创造了宁静的生活环境。

嘉靖七年十月，王阳明旧病剧发。王阳明自小多病，后来又被贬官蛮荒地区，湿热炎毒，长久不得根治。任职赣南时，军马倥偬，军书傍午，力疾从事。待出征广西之时，已是医药难施，加以军务劳苦，西南山野的热毒，更使病体沉重，上吐下泻不止。不得已只好起身归途，叫人抬着逾过粤赣交界的梅岭关，行至南安府大庾县改乘舟船。行至青龙铺码头，病势恶化。时有南安府推官、学生周积服侍在身边，请问遗言。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全集·年谱三》）不久即瞑目而逝，一代伟人就此停止了他的思想，时为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公元 1529 年 1 月 9 日。王阳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完了他苦难重重的一生。死讯传出，凡在江西任职的王阳明学生全部赶到。当灵柩运到南昌，士民日夜哭奠，拦道挽祭。他的学生钱德洪、王畿正在趋京赴殿试途中，闻先生死讯，急转道南下趋南昌迎丧，并主持丧事。嘉靖八年二月，棺柩运抵绍兴，朝夕设奠，学生、友人来吊唁者每天达百余人。十一月，安葬于绍兴兰亭乡洪溪，会葬的学生友人官宦达一千余人。

王阳明文治武功，勋业卓著，堪称一代名臣，万世师表。隆庆二年（1568），诏赠新建侯，谥文成，颁铁券。穆宗在券文中说：“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毛奇龄《续补王文成传本》）万历十二年（1584），诏从祀孔庙。他的著作由他的学生编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

二、阳明学说的内涵

王阳明一生，功业卓著，仕途坎坷，官场失意，他在历史上最足珍贵的在于学术活动，最突出的是创立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思想体系，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姚江学派”。王阳明将自宋以降“心学”与“事功”两大思想融会贯通，经过深细的比较与痛苦的反思，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纲领性哲学命题，并给予了创造性的发展，对僵化的程朱理学予以严正的批判，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阳明学说”。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之所以称之为“心学”，盖因王阳明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传习录》上）。他认为天下一切事物无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即心）而存在，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

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阳明心学由孟子的心性学说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孟子看到的是人性善的一面，荀子看到的是人性恶的一面，王阳明看到人性存善存恶的两面，故此提倡以“致良知”去修身养性，为善去恶。

王阳明经过长期的磨难、酝酿和总结，到五十岁时正式提出“致良知”这一哲学命题，用“良知”来表达他最本质的内容。“良知”是指人的不依懒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感情、是非标准，是人所固有的。“致”字有着追求、扩充、实施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使“良知”扩充到全体。“致良知”就是要人们去掉昏蔽的私欲，去发现本心的虚灵明觉的本体，改恶向善、去伪存真、去蔽合德，去暗就明，去愚为圣，达到真诚坦恻，渐渐进入到圣贤的境界。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既不同于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他反对把“知”与“行”分作两段，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传习录》上）。这就是说，知与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两者是不能分解的，是没有先后之分的。他是要人们以各自的思维能量去求得实践的效率。他为道德实践而立言，使知行本体（良知）贯彻于生活行事，以成就生活之意义与人生之价值。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的中心，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他认为“人欲”妨碍道德的贯彻，因之必须破除人心所受到的“物欲”的昏蔽。“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传习录》上）。

阳明心学即是以“致良知”为其核心，以“心即理”、“知

• 10 •